# 不在纸上,就在路上

当你翻开这页报纸,写下稿子的记者正奔波在路上,深夜下班的编辑还在梦乡。

在这页纸上,我们不讲反腐法治,不说社会突发,抛弃那些“高大上”,来讲讲2014年新闻之外的故事,来讲讲几位年轻编辑记者的故事。

你知道弃婴岛,但可能不认识雷泽宝这个频频被命运捉弄的普通人,把随身的几百元钱捐给他,记者仍觉得什么忙也帮不上;你知道城管乱收费被查,但可能不了解多少次采访才能做到这样;你知道四中全会召开,但大规模报道背后,是凌晨四点编辑们一步步的策划冥想。我们是记者或编辑,但也是常人。温情和敬意,专业与操守,当我们的心离你很近,我们做出的报纸才能离你更近。

新一年的日历刚撕到第3页,剩下362天的故事正在慢慢写,瞧好了!

## 多想让温暖绽放在你嘴角

本报记者 张泰来(机动新闻中心)

2014年3月底,我在连方向都搞不清楚的广州,转了3次车,去见一个名叫雷泽宝的中年男子。

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,运行48天的广州弃婴岛因为弃婴数远超预期宣告关闭,在关门当晚,一对夫妇抱着出生仅17天的女儿来到这里,被告知岛已关闭的瞬间,两人嚎啕大哭。

哭泣的丈夫就是雷泽宝,他不到20岁离开四川谋生,在广州呆了十几年。35岁前,他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,一度消沉,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。

据他说,前妻脾气坏,两人总是吵闹,现在的妻子虽然不怎么漂亮,但对他很好,两人打零工,开摩的,捡破烂,挣每一分能挣到的钱。再后来,妻子怀了孕,虽然依然住着简陋的房子,他却觉得命运之神正在为他打开一扇门,女儿还没有出生,就取下了“莉莉”的名字。

可是,莉莉出生不久就被查出先天腭裂,先天性双下肢短缩。夫妻俩整夜地抱着女儿不忍撒手,却对高额治疗费束手无策,甚至进一步的检查费都拿不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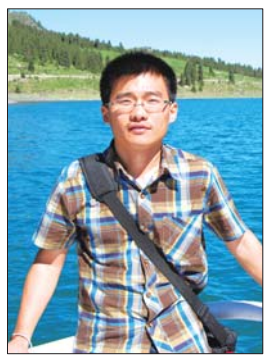
告辞前,我看到了躺在母亲怀里的莉莉,大大的眼睛,丝毫也看不出异样。我在心底说,这要是个正常孩子该多好,但除了随身带的几百元钱,我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转眼又一年,一个场景在我脑中不断闪现:雷泽宝聊天时接了个电话,当地一个记者说有医院能免费为莉莉做检查。那个瞬间,由衷的笑意绽放在雷泽宝的嘴角。

一个个体能量有限,但每人发出一道光,哪怕只是微光,人多了也能照亮一片天。

## 生命无常,慢一些才心安

本报记者 李钢(时政新闻中心)



新年前后接到不少采访对象的祝福,其中有一条尤其让我感动,不是因为说辞新鲜,而是感悟于她的心境。

发祝福的是一位做过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闫淑青。2013年3月,年仅15岁的聊城男孩闫森突发疾病身亡。为让生命延续,其父母决定将孩子器官捐献。最终,五人得救,闫森的亲姐姐闫淑青也是受体之一。

第一次采访闫淑青时,她刚做完手术,还不知道自己移植了弟弟的肾。由于家庭贫困,在媒体报道下,她一家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。再次见到闫淑青是2014年清明节,她陪伴母亲第一次到山东省暨济南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碑“看望”弟弟。“弟弟用生命救了好几个人,他肯定希望我们好好地活着。”出院后的闫淑青很快成为了聊城爱心驿站的志愿者。去年6月14日,爱心驿站走进马西;6月30日,爱心驿站回访李台;10月17日,爱心驿站暑期捐助……她的朋友圈记录了每一次爱心行动。

“生命无常,心安为福。”闫淑青的心安既来自乐观生活,更来自于助人为乐。

作为医疗卫生口的记者,几年来接触最多的莫过于生离死别,感受最深的也莫过于生命无常。不少人奔波在人生路上,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生活就又匆匆地离开了。

“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,广厦万间夜眠不过三尺。”新一年我们为生活奔波时,是否能偶尔放慢脚步,关注下身边的人,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安康,也让自己能更好地感受生活的幸福呢?

## 忘记全世界也没忘记爱你

本报记者 韩逸(烟台记者站)

一直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真爱,只是很少被遇到,很少被发现,又很少被珍惜。

也一直觉得,不论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情深,真爱的模样必定是平淡。熟悉的炖鱼头的味道,肥皂洗出来太阳晒过的衬衫的味道,黄酱炸酱面的味道;孩子在夜晚里哭叫的声响,加班时QQ亮起来询问几点回家的声响,老灶台上咕嘟炖着姜母鸭汤的声响……一朝一夕,最初见面时的心动,热烈,挣扎,挚诚,都变成了漫漫岁月里无言的支撑。

2014年10月份报社发起了黄手环活动,给容易走失的老人发放黄手环标记联络方式。我和另一位记者到城郊一个敬老院,认识了一对老“情人”。老头儿95岁,老太太96岁。他们不是夫妻,都因为年岁过长记性变得很差,甚至老太太都不能明确叫出老头是谁。但是有意思的是,可能因为长相接近,老头儿来到敬老院的第一天,就把老太太认作成已故的老伴儿。

于是老头儿每天坚持,真的是每天,去老太太的房间外面往里望一会儿。这一望,是习惯,也成了日常。他们偶尔也会聊聊天,但通常记不住哪些说过了,哪些又没有说过。只是在老头儿来的时候,老太太心里知道,这人是一个友好的存在。

这一天天,老头老了,不记得自己是谁,不记得吃过的饭,走过的路,读过的诗。

但是老头儿依然记得,如果不去老太太门外往里看一眼,就好像少了点什么。这是爱情吗?一定是了。有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了,依然想看看你好不好。

## 那些做“便衣女警”的日子

本报记者 王媛(图片新闻中心)

2014年5月底,正在济南市中刑警大队采访的我得到线索,刑警要去抓吸毒者,刚成立专案组。当时还有二十几天就到禁毒日了,我兴奋地跟主任报题,然后开始了接下来的29天的便衣生活。

跟案子后,我有些“死皮赖脸”。看到刑警们一有动静,我就跑过去问:行动吗?去哪里?刚开始他们觉得我一个姑娘,到哪里都不方便,但在我纠缠下,慢慢熟络了。专案组一般上午休息,下午和晚上行动,我跟着他们经常一宿一宿不睡觉,民警开玩笑,说我“像是没家的孩子,整天泡在局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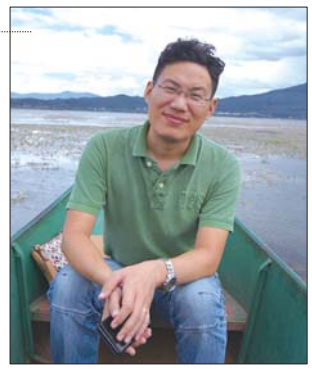
抓吸毒者常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几小时。6月初的天已经很热,为了不引起注意车内不能开空调,几个人挤在一辆商务车里,那个闷啊。

专案组里有近50个民警,行动的时候女民警几乎不会跟着。而我相机往挎包里一藏,就临时成了“便衣女民警”。有一次晚上10点多去抓人,我把相机往身后一藏,故意将嗓子捏得尖尖的,“哥,开门,是我啊!”两个便衣刑警持着枪,紧贴着门边的墙壁。伴随着一句“谁啊”,嫌疑人毫无防备地开了门,刑警闪电般冲进屋子,用枪制服了他。随后我进去,拿出相机拍照。在相机里,嫌疑人裸着的上身满是文身,大粗金链子来回晃荡,我尽量让自己端着相机,其实我是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29天采访,稿子见报后很多人在朋友圈给我点赞,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不能这样不顾后果。又是新年了,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激情,我还可以更大胆地往前走。

## “深闺”大师的赠予

本报记者 张榕博(洪波工作室)



不管接不接我的电话,他都会坐在北师大一幢红墙房子的窗边,散乱着白发,无声无语。

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与影视喧嚣的时代,看着余华、严歌苓、莫言这些弟子们风风火火,耄耋之年的童庆炳却仿佛自锢在黑影中,在弟子背后发挥余热,让满架的书籍陪伴余生。

人人都想知道,一位培养出十几位文坛大家的大师,在人生接近尾声之时有怎样的感悟?我也想知道,但我只有不成体系的追问和一颗忐忑的心。

童庆炳是一位极友善的长者,问清来意后,他给了我地址,甚至表示,电话采访也可以。

面谈的魅力远超一切。就像一个久久思索而等待听众的普通老人,他讲述他的事业,他的经验与智慧,他年轻而无知的弟子们,以及浅显易懂的文学创作经验,我只需要听。

在童庆炳口中,每一位文学大家都曾经青涩与迷离,毕淑敏曾经骑着自行车在清晨的长安街上疾驰,为了一堂创作课。严歌苓曾因忙于自己的事情逃课,在美国初遭失意后才意识到知识的重要。莫言永远富有乡土气息,而迟子建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。

张爱玲曾说“同学少年都不贱”,童庆炳给予我的印象恰恰是一个从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作家,那些尚没有光环笼罩的奋斗史,才是最真的人生经验。

新年里我再联系童庆炳时,他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,或许他正在熟睡,或许仍在微笑着思索,在灯下继续深耘。

## 死磕雾霾,大家都有份

本报记者 廖雯颖(经济新闻中心)

“今年,要坚决扭转污染加剧的势头,按照老百姓的话说,跟大气污染死磕。”

2014年1月15日下午,面对台下17市副市长和环保局长,省环保厅厅长张波这句话就像银针落地一样,硬而清脆。埋头记录的我瞬间抬头,想读懂他的决心。

这时我刚跑环保领域半年,迎来当环保记者的第一个雾霾绵延的冬天。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空气质量指数。那些居高不下的数字看得令人火大,至于雾霾到底怎么来的,没有人给出定论。

连续多次曝光了违规排污的燃煤热电和锅炉后,我既气愤又不解,问环保部门:“这种情况为什么还不停产整顿?难道就让它一直超标下去吗?”分管具体事务的处长叹了一口气:“采暖季停了锅炉,让这个片区靠锅炉取暖的老百姓怎么办?”气鼓鼓的我顿时语塞。

“大气治理背后是经济发展思路,治理不能只靠环保部门,也不可能立竿见影。既然已经得出源解析结果,就按照污染源逐个治理,这个方法笨,但肯定能见效,请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和耐心。”一位基层环保局负责大气事务的处长说得很实在。

有一种状态叫“赶上了”。雾霾就是这样,多年沉疴一朝爆发,我们避无可避。过去的2014年,尽管山东省的空气质量仍不尽人意,但它确实在改善。

“新常态”这个词,我想也可以拿来形容2015年的雾霾阻击战。接受心理落差后,沉住气,脚踏实地,来一场全民参与的大气保卫战吧。